

潘天群 主编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丛书

米塞斯的行动学 方法论研究

邹顺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潘天群 主编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丛书

米塞斯的行动学 方法论研究

邹顺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论研究 / 邹顺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161-3400-9

I. ①米… II. ①邹… III. ①米塞斯, L. V. (1881~1973)
经济学—方法论—研究 IV. ①F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386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韩国茹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王树图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48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研究》（第一辑）丛书

序 言

知识是一直人类追求的目标，而获得新知识的方法大体有两种：第一，从已有的知识通过有效推理得到新的知识；第二，从观察与实验所得到的数据中合理地归纳地出新的知识。前者是逻辑推理；后者是科学探究。对推理有效性的研究构成逻辑（学），而对科学探究的规则或方法的研究构成科学方法论（或科学逻辑）。

逻辑学被认为是研究推理规则有效性的学术。逻辑学是一门古老但又是充满生机的学科；它被认为是基础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学科。逻辑学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无需本人这里赘言。目前，不同学科如哲学、数学及计算机科学都关心并研究逻辑学；逻辑学对这些学科的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逻辑学时的重心与研究目标存在差异。

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科学家研究现象以获得新知识或修正先前知识的方法或规则总体。近代科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科学方法的巨大效力。科学方法使得科学不同于其他人类传统，而科学方法的主要特征是：经验证据在对人们对自然的探究中起到中心作用。科学研究者构建假说或理论以说明现象，用实验检验这些假说所推导出的预言。当一个假说的预言得到证据的证实，该理论得到支持；而当其预言被证据证明为假，该假说便遭遇挑战。观察与实验是获得证据的手段。这个检验的过程是可重复的。

科学方法论是对科学活动中的方法与规则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既包括对科学家所应当遵循的一般性行动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某一个或一些学科实际使用的方法、规则及假定的系统性分析与研究。前者是规范性的——给出科学家所应当遵循的一般性的方法论规则；后者是描述性的——研究实际科学是如何运行的，包括科学家如何提出假说、如何辩护

自己的假说、反驳他人的，等等。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方面可以给实际中的科学家以行动指引，另外一方面可以使我们理解科学以及理解人类本身。

我们推出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丛书，旨在推动中国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学术研究，以与国际接轨。这里的逻辑是指广义的逻辑，而不仅仅是狭义的数理逻辑；这里的科学方法论也是广义的，既包括关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又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这些研究可能粗浅，本人希望这些研究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些研究中错误也在所难免，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潘天群

2013年4月于南京

目 录

导言 米塞斯：新奥地利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父	(1)
一 米塞斯：奇人奇事	(1)
二 米塞斯研究的历史背景	(6)
三 本文研究的基本结构	(16)
第一章 米塞斯的行动学理论概述	(20)
第一节 米塞斯论行动：行动作为人的本质	(22)
第二节 米塞斯对行动与理性关系的辨识	(29)
第三节 米塞斯行动学的理论框架	(36)
第四节 米塞斯行动学与马克思实践论的比较研究	(40)
第二章 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论及其理性主义的建构	(49)
第一节 米塞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49)
第二节 米塞斯的方法论及其历史比较	(57)
第三节 米塞斯行动学的方法论先验论	(63)
第四节 米塞斯行动学的公理化准形式体系	(70)
第三章 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认识论基础	(76)
第一节 行动学的社会学视角：米塞斯与韦伯思想的比较	(76)
第二节 米塞斯行动学的价值理论与历史诠释学	(83)
第三节 米塞斯的不确定性思想及其概率逻辑	(98)
第四节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两条行动学路径 ——米塞斯与兰格的行动学思想比较	(107)
第四章 米塞斯对经验主义诸形态的理性主义批判	(119)
第一节 米塞斯论行为及其对行为主义的批判	(120)
第二节 米塞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135)
第三节 米塞斯对物理主义的批判	(138)
第四节 米塞斯与逻辑经验主义的比较研究	(143)

第五章 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发展及其反思	(151)
第一节 后米塞斯行动学的新发展	(151)
第二节 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对行动学方法论的重要启示	(162)
第三节 当代行动理论评述	(181)
第四节 从行动到行为：从当代经济行为的综合研究视角	(187)
结语 对米塞斯批判的批判	(206)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导言 米塞斯：新奥地利学派 与新自由主义之父

一 米塞斯：奇人奇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奥地利学派的开拓者和 20 世纪上半叶最坚定的新自由主义学者。他的弟弟理查德·冯·米塞斯（Richard von Mises, 1883—1953）则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成员，也是著名的工程物理学家与概率论数学家。最引人注目的是，L. 米塞斯是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与自由主义政治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最亲密的老师。

米塞斯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加利西亚（Galicia, Austria - Hungary）地区的首府列姆堡市。列姆堡是一个拥有 750 多年城市史的美丽东欧古镇，现在隶属乌克兰，已改名为利沃夫（Lviv），是乌克兰著名的文化商业中心之一。米塞斯家族是当时奥地利的贵族世家，L. 米塞斯的父亲阿瑟·米塞斯（Arthur Edler von Mises）是铁路工程师；他的母亲阿德勒（Adele Landau Mises）来自于劳丹家族，是当时奥地利议会自由党副总裁 J. 劳丹（Joachim Landau）的亲侄女，后者与同为自由党人士、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建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 1840—1921）的兄弟关系密切。米塞斯的父母都是犹太裔。独特而优裕的家庭背景使得米塞斯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年少之时他就掌握了德语、法语、依地语（意第绪语）、波兰语、拉丁语以及乌克兰语。

在全家回到祖居地奥地利之后，米塞斯于 1900 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学习，于 1906 年获得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受到门格尔的重大影响，并且成为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 Bawerk, 1851—1914）的学生。众所周知，卡尔·门格尔和英国的文杰斯、法国的瓦尔

拉斯同为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在维也纳大学创立了奥地利经济学派，他的儿子、数学家小卡尔（Karl Menger）则是后来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门格勒的学生，庞巴维克著有《资本与利息》，并以其《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书而声名显赫。当时，米塞斯与大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毕业之后，米塞斯进入奥地利商业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并成为奥地利政府的经济顾问。后来他在奥地利大学任经济学兼职教授（1913—1934），在1926年他与哈耶克创立著名的经济周期研究所。几乎在同一时期，米塞斯开办了私人研修班（即著名的“米塞斯学圈”或“维也纳学派”（the Mises - Kreis or Vienna School）），其成员有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 - Rodan）、舒兹（Alfred Shutz）、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和罗宾斯（Lionel Robbins）等人，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广有影响的大经济学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二战前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血腥恐怖政策，米塞斯在1934年被迫逃亡瑞士，在日内瓦大学研究生院担任经济学教授（1934—1940），期间与匈牙利女演员玛姬（Margit Herzfeld Serény）结婚。后来他辗转流离、定居于美国，在纽约大学任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 1945—1969）。在纽约，米塞斯又重新创办起私人研修班，吸引了一大批美国学子，这些人成了在美国宣传和发展自由主义和奥地利经济学的新生力量，其中的罗斯巴德、科兹纳、梨左等人则是有名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建立了20世纪上半叶最综合且最全面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他在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自由市场学说和经济方法论等主要的四个领域^①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把门格勒所开创的传统奥地利学派提升到新奥地利学派，并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以市场过程理论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他独具特色地把现代演绎科学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并提出了统一社会科学的行动学（praxeology 或 praxiology）理论设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论（the theory of practice）相对应，米塞斯的行动学把人的

^① 经济方法论家菲比则将米塞斯的学术贡献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理论、经济方法论和市场理论，参见 John Pheby, *Methodology and Econom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acmillan Press, 1988, p. 96.

行动作为科学研究的元范和基点，其体系为现代经济学方法论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呈了重要的探索路径和启发价值。从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视角对米塞斯的行动学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是经济思想史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必要课题，也构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篇章。

正像经济理论史家约翰·米尔斯所说：“经济思想史是这样一个历史：它已经显示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那就是要退回到与在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货币主义者们的看法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那些观点相同的观念去，这种趋势，只有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盛行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时间中才被打断了。”^① 在古典经济学正式形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体制以来，先有 19 世纪后期的“边际主义革命”（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再就是对当代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凯恩斯主义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继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 20 世纪下半期掀起了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的范式颠覆，而这种右翼的反革命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又反过来遭到了以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等左翼思想的严厉批评。凯恩斯主义的崩溃不仅引起了经济理论和现实政策的大规模范式转换，也带来了对经济思想史本身的当代反思。这种深刻的反思在后来也不仅仅限于左翼思潮与绿色和平运动及其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范式理论的演进，更明显的变化表现为广泛跨学科的对经济理论和思想自身的批判性反思，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经济学方法论——顺势登上了学术舞台。就像米尔斯所感叹的那样，一切都有待于时间的洗练与历史的征程，但现实境况似乎是，人们仍然陶醉或者流连在昔日凯恩斯主义的辉煌战绩中，而忘却了新范式的反批判的潜在后果。因而，经济学方法论作为针对现当代政治经济思潮的批判利器，其学科内在的发展使命有待于超越右翼复古思潮的羁绊和左翼激进思潮的局限，即其系统而深广的批判力量不仅要体现在对凯恩斯主义的经验教训和对新自由主义的正面交锋上，也必须展现它对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的自我批评和与时俱进所起的实践功用中。

众所周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经济理论基础包括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等几大支柱，而在 20 世纪的两大经济范式转换中，即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这两大学派直接构成了对货币主义“影响最大的

^① 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28 页。

思想”和“两种互不相同的来源”^①。尽管这两大学派在经济理论及其经济政策上表现出不同的渊源和特色，其方法论互相矛盾、甚至于相互敌对^②，但是，它们共同持有了一些趋于一致核心理念：“首先，他们坚定地相信新古典价格理论在解释人们所看到的经济行为方面所具有的力量。其次，他们相信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所具有的效力要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最后，他们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应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③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来自于方法论层面的核心理念，即他们还体现了内在于经济学理论的鲜明方法论特色。在芝加哥学派中，弗里德曼著名的“操作主义”是实证主义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代表性形态。对于新奥地利学派中的，米塞斯、熊彼特、哈耶克和马克卢普等所谓的“四巨头”，其中熊彼特（包括马克卢普的部分思想）倾向于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而米塞斯和其弟子哈耶克则把理性主义推行到了极端。从认识论和逻辑哲学的视角来看，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不仅有着最独特的体系，即人类行为学，而且他还尝试着把哲学和逻辑贯穿到整个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他不仅是一个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首先发起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和攻击，而且还建构起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学综合理论体系。此外，他还较早发展了货币理论和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理论，这直接为哈耶克在1974年登上诺贝尔奖台铺就了成功的道路。他是一名执著的新康德主义者，在新历史主义的批判基础上把经济学推进到极端理性主义，并且，他大胆吸取了现代科学革命的新成果，把现代形式逻辑引入到经济分析中，其经济逻辑思想为后来的博弈论发展路径提供了开拓性的先驱思考。基于对经济行为的系统研究，米塞斯的行动学理论无论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还是对广泛的行为科学研究都有着重大的启迪价值。因而，从逻辑和哲学的角度对米塞斯的经济方法论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

① 参见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9页。

② 比如，杜哥儿通过对货币主义的实证主义与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的比较指出，前者代表了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F-扭曲，后者则代表了S-扭曲，前者把理论的功用指向经验事实的预测与观察检验，后者则否认历史、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有机关联，前者是建设性和积极性的，后者是消极性和虚无性的；它们代表了后来经济学方法论的两条截然对立的发展路径。参见William M. Dugger, "Two Twists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Positivism and Subjectivism",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42, No. 1. (Jan., 1983), pp. 75—91.

③ 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2页。

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理论价值。

从这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情况来看，对经济行为的研究构成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主题。而对经济思想史进行深入追溯，奥地利经济学的经济行动理论，特别是冯·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论就鲜明地显现在我们面前。在“凯恩斯革命”以后，奥地利学派一度沦落为非主流经济学派别，其关于经济行动的广泛理论成果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而且，在我国，由于奥地利学派的自由主义核心经济理念，尤其是庞巴维克、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评，我们对奥地利经济学派及其经济行动理论，特别是以米塞斯为集大成者的行动学方法论在改革开放前怀有规避和敌对的学术立场。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局势的变迁，一方面是全球资本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导致了人们在学术上开始重新重视和转向非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广泛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大规模的、长驱直入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1990年左右的苏东剧变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评价关于计划与市场之争的“米塞斯论题”，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宏大事业必须直面全球资本主义的竞争态势并与之积极互动，及时研究和深入认识新自由主义就成为当下的紧迫议题，而对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方法论剖析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必须得到重新认识和合理评价。作为奥地利学派总体方法论的建构者，米塞斯的行动学方法论是此认识议程中的必经桥头堡，对其基本方法理论进行历史总结、比较研究和逻辑分析成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迫切课题。从逻辑哲学的角度看，逻辑与行动及其复杂关系是科学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主题之一。在经济思想史上，米塞斯以其独具特色的人类行动学理论体系对这种关系做了深刻研究，而且，以经济行动为支点，米塞斯把行动学推广到涵盖几乎全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以对行动学的方法论研究为基础，我们可以凭借这条重要的理论进路对行动逻辑和逻辑行动主义进行全面分析，从而揭示出逻辑所内在的深广社会功能。

二 米塞斯研究的历史背景

(一) 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历史背景

方法论作为独立的学科，其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马克卢普指出，在康德建立认识论与方法论之后的两百年，哲学家们一方面就认识论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就方法论和逻辑的关系问题争论不休。^① 早在名著《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把方法论简明地定义为“对方法的超验性研究”。作为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康德综合了以培根的归纳方法为基本出发点的经验主义和以笛卡儿演绎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两大立场的思想成果。康德在其早期受到德国思想传统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在休谟怀疑论的巨大感染下发动了认识论的“哥白尼式革命”，即在深入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之同时，通过把理性建立在人的经验认识基础上，构建起理智与感性的和谐关系，以使人类的认识找到可靠的基石。胡塞尔认为，传统的哲学问题与逻辑争论紧密相关，这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 逻辑学是一门理论性学科还是一门实践性学科（一门‘工艺学’〈Kunstlehre〉）”；“2. 它是否独立于其他科学，尤其是独立于心理学或形而上学”；“3. 它是否是一门形式科学，或者像人们习惯于说的，它是否‘仅仅与认识的形式’有关，它是否也须注意认识的‘质料’”；“4. 它具有先天的和证实性科学的特征，还是具有经验的和归纳性学科的特征”。^② 而“康德以及其他‘形式的’和‘纯粹的’逻辑学代表人物所企图建立的科学”，其目的就在于“划分出一门新的、纯粹理论的科学，它构成任何一门关于科学认识的工艺学的最重要基础并具有一门先天的和演证性科学的特征”。^③ 可以说，康德的认识论体系中所蕴涵的逻辑思想及其方法论理论为后来的发展路径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如同恩格斯和怀特海所强调的那样，西方哲学的最终源头必然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而康德思想正是这一追问过程中的转折点。从康德以后，

^① Fritz Machlup,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1978, p. 5.

^②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 纯粹逻辑学导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7—8页。

黑格尔对逻辑作了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极端发展。黑格尔指出，哲学可以定义为对思维的考察，而作为形式的思维正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质。^① 作为“研究思维、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逻辑学构成了哲学科学的首要部分（其他两个部分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但是，在黑格尔看来，逻辑学所研究的纯粹思想属于自为自在的绝对理念，一方面，“认识到思维本身的本性即是辩证法，认识到思维作为理智必陷于矛盾，必自己否定其自身这一根本见解，构成了逻辑学上一个主要的课题”^②。另一方面，他的辩证逻辑在强调促成思想或理性与经验现实一致性的最高哲学目的之同时，其经验现实却“属于意识所形成的外在和内心的世界”^③，即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头足倒立的唯心主义形态。这也正是马克思建立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加以纠偏和扭转的核心基点所在。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观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与米塞斯所继承和发展的行动学思想形成了直接而尖锐的两分对立，我们将在后面就此深入研讨。

和马克思几乎同一时代，作为方法论核心理念和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的逻辑学进入到纷繁复杂的研究时代。一系列重要人物相继涌现出来：波尔扎诺、汉密尔顿、德·摩根、狄德金、布尔、穆勒、文恩、康托尔、皮尔斯和布伦塔诺，等等。在前期，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进一步批判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同时，也对康德的逻辑思想展开深入的哲学评析，并希望以更准确和更有效的推理形式来实践莱布尼茨的普遍逻辑理想。波尔扎诺（鲍尔查诺）的《科学论》（1837年）副标题为：“试图经常地引证那些迄今为止论述过逻辑的人们的著作来对逻辑做出详尽而崭新的表述”。就像涅尔所说的，波尔扎诺之所以把他的主要著作叫做《科学论》，“也许他所指的不但是中世纪把逻辑解释为方法的方法，而且是莱布尼茨谈到的研究各门科学结构的一般科学”^④。穆勒则在保留形式逻辑演绎体系的前提下对归纳方法作出了杰出贡献。穆勒的《逻辑体系》（1843年）“认真地尝试用一种与英国哲学的经验传统相一致的方式来原因逻辑。……说明归纳法以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⑤。这本名著可以说是19世纪方法

①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二版，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51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④ 参见涅尔等《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60—461页。

⑤ 涅尔等：《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76页。

论研究的顶尖之作，在书中他提出当时最完善的方法分类，对演绎、归纳、抽象、具体、假说、确证等各种科学的或实验的方法作了详尽解说。穆勒同时也是一名重要的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在经济思想史领域，穆勒的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集大成体系，它不但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革命”的前夜，其实证主义理念更经由英国剑桥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而直接构成了现代实证主义经济思潮的重要渊源。而在这几个主要的研究领域里，并且在相当程度上，米塞斯与穆勒存在着直接的传承影响。

但是，“当逻辑在 19 世纪中叶振新的时候，新的生命力是来自那些熟悉自己专业进展的数学家，而不是来自那些从事唯心主义和经验主义争论的哲学家”^①。随着弗雷格建立较为完整的集合论体系，并把逻辑从数学中完全独立出来，逻辑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现代事业。涅尔以赞叹的口吻指出，弗雷格“比他的任何前辈都更进一步要求在逻辑研究中的形式严格性，他精心构造的演绎系统或演算是在这个问题的历史上最伟大的独特的成就”^②。我们将看到，米塞斯正是通过在经济方法论中对这种现代演绎科学的全盘引用而建立起其庞大的行动学理论体系。而这种引用在本质上根植于奥地利哲学对于逻辑一贯重视的深厚历史传统。如纽拉特所言，波尔扎诺等人试图建立严格的逻辑新基础，在他之后，布伦塔诺则更直接地从中世纪逻辑和莱布尼茨改革逻辑的努力出发，从而使得奥地利哲学偏离开康德和唯心主义哲学。^③因而，米塞斯的逻辑哲学背景可以从这种历史线索中找到谱系渊源，而他对历史主义的误解、对实证主义的拒斥和对新康德主义的迷恋既表征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志趣，也难以超越哲学思潮的具体历史局限。

（二）米塞斯思想的研究状况

米塞斯所师承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是由门格尔在边际主义革命中所开创的。米塞斯的博士生导师庞巴维克是门格尔在维也纳大学的学生和继承者。杰文斯、瓦尔拉斯和门格尔三人被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米塞

① 涅尔等：《逻辑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484 页。

② 同上书，第 549 页。

③ 参见 Barry Smith, *Austrian Philosophy: The Legacy of Franz Brentano*, Chicago and LaSalle, Illinois: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p. 16.

斯的经济理论在现代背景下则代表了微观经济学的综合体系，同时他在更广泛的领域中构筑了奥地利学派所特有的方法论框架。米塞斯的学术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货币理论，商业循环或经济周期理论，行动学方法论，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前两个理论是米塞斯早期的成名之处，也是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者较为重视而后来被渐渐遗忘和更新取代的方面。本书所着重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则集中在其后期的行动学方法论方面，也在相当程度上关涉到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特别是他所引发的计划与市场之争，以及他所开创的新奥地利学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强势而风行的政治经济思潮，后面这些方面展现了行动学方法论的广泛影响。米塞斯的自由放任思想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从欧洲大陆向美国甚至于全世界不断地扩散，这也是他成为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的基本原因。

1919 年，米塞斯发表《国家、地区和经济》（*Nation, State and Economy*）一书，这本书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齐名，被视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有说服力和富有预感色彩的经济自由主义分析名著。1920 年，米塞斯开始对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思考和批判，提出了著名的计划与市场二律背反的“米塞斯论题”，这为后来横跨整个 20 世纪的计划与市场之争揭开了序幕。这次争论为米塞斯赢得了世界性的（批判性）声誉，同时，它又是门格尔所引发的“方法论之争”的继续与超越。但是，这次争论从一开始就局限于经济理论的较量，直到兰格在 20 世纪中叶以后针对“米塞斯论题”提出整体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法论批评，同时米塞斯在 1949 年出版其巨著《人类行动》（*Human Action*）以后，对行动学方法论的剖析和批判才大范围和大规模地展开。五十年代以后，米塞斯逐渐淡出学术舞台，他在维也纳大学和纽约大学所指导的学生们（哈耶克、马克卢普、罗宾斯、科兹纳、罗斯巴德等）则把方法论的重要传承继续推行下去。在哈耶克获得 1974 年诺贝尔奖和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以前，米塞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在这之后则形成了广泛的研究热潮。

国外对米塞斯行动学方法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奥地利学派学者在内部对其方法论体系的评述和发展；二是学派之外的经济学家们对它的研究，这又包括包容式的论述和批判性的反思两种路

径；三是在经济学体系之外，如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范围的相关研究。这三个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研究成果，但都局限于具体的专业研究背景以及论证的语用情景，其研究是分散性和零星式的，缺乏跨学科（尤其是在哲学、经济方法论和经济思想史的综合层面上）和跨时代的比较研究，没有结合当代学术思潮的最新论述。但是，在将这几个方面有机地统合起来进行综合性总结的基础上，特别是超越单纯的方法论研究资料，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经济方法论研究现状的发展线索。

首先，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实证主义思潮掀起了整个学术转向的主流风波。英国新古典主义经济理念最终被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边际主义的期望效用理论忽视了门格尔所开创的行动研究进路而走向了经验主义取向。在奥地利学派内部，熊彼特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之后也开始了实证主义的变身，后来的哈耶克和马克卢普也采取了亲经验主义的立场。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与庞巴维克和维塞尔发生了在学派发展思路上的激烈纠纷，奥地利经济学派正处于衰落的边缘，也面临着解体的危机。米塞斯在创立私人研修班之后，开始考虑在门格尔思想基础上发展奥地利学派的重要问题。在新的时代情势下，米塞斯对门格尔思想进行了新的解释，通过吸收新历史主义的新康德主义理论精粹和把现代数理逻辑引入经济分析框架中，他以经济行动的演绎科学体系重构了学派的发展新理路，这后来被广泛地称为“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新奥地利学派更加重视方法论的研究旨趣，并把原先的哲学基础延伸到逻辑方法，同时它走入了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政策取向，这又构成了现代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支柱。后来的新奥地利学派成员（包括参加过米塞斯私人研修班的其他学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对米塞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罗宾斯的经济学行动定义、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思想、马克卢普的方法论理论、科兹纳和罗斯巴德的自由市场观等是这条路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宾斯因为仰慕米塞斯早期对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的贡献而特意参加了米塞斯的维也纳私人研修班。^① 后来罗宾斯不仅把哈耶克引进了伦

^① 斯考森写道：“这一私人研讨班是一个讨论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非正式论坛，每周五傍晚，在他（即米塞斯——引注）商业厅的办公室举行。然后，这群人会在他们最喜欢的咖啡馆里吃晚饭，并在那里一直呆到凌晨一点钟。参加研讨班的人都是应邀而来，每个参加者都把接到邀请看得无比光荣。”参见马克·斯考森《现代经济学的历程》，长春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92—293 页。